

今日视点

“政府食堂”恐怕恰恰在自证腐败

无锡开发区在湿地公园内按四星级酒店标准建造一家豪华会所,专门招待领导和高级客商,刚刚开张两个月,开发区就在这儿消费了至少180万元。网友纷纷对此表示质疑,而无锡惠山开发区党政办主任王志瑛则说“网上的东西也真是的。共产党办一个酒店就不行了?不就是为了招待领导的时候标准高一点、接待好一点吗?”

(1月19日《现代快报》)

许多人对这种说法难以接受,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因为他们

还不太清楚王主任那套逻辑而已。如果你学会用他的思维来看问题,你也会觉得“网上的东西真是的”。一切的不满,都是因为网民把这看成一家专门服务官员吃喝的豪华会所,但如果把它看成是政府食堂,那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因为顶级豪华会所就是政府食堂,所以它可以不对外开放,专供官员吃喝;因为是政府食堂,所以不必纳税,甚至连工商营业执照也不必办理;因为是政府食堂,建设用地也不用向国土部门缴纳

土地出让金,也不用报批立项就把会所建在风景优美的湿地公园内——打着一个政府食堂的幌子,就可以绕开一切法律法规的约束,把豪华会所当成官员群体私家专属地,而且会所赚来的钱兴许还可以拿来发福利分红做小金库。天啊,这是何等天才的主意!

怪不得党政办主任大言不惭说“这有什么好质疑的”,他们已将各种可能受到的质疑早就推演了无数次。但唯一不能解释的是:谁给你们权力建如此豪华的政府

食堂?你固然可以把一家豪华会所称为你们的食堂,然后说响应国家政策、领导都在食堂吃饭,并把这当成一项廉政政绩,一边享受着奢华与山珍海味,一边把公款变私款,但无论理论有多完美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算计着如何把纳税人的钱吃进嘴里装进兜里。所以,当党政办主任把豪华会所解释为“政府食堂”时,尽管显得能说会道聪明无比,但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公务浪费自证成隐性腐败。(范大中)

第二落点

“其实就相当于政府搞的食堂,只不过是‘特殊食堂’罢了。”无锡市惠山开发区党政办主任王志瑛把一个“豪华会所”说成是“特殊食堂”,意在强调“食堂”二字;而“特殊食堂”扎眼的地方,其实在于“特殊”二字。

按“特殊食堂”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一直有惠山经济开发区的官员在此开会、宴客,年底到这里来开总结会的政府部门也很多”,“一般中午简单吃吃是每人

这简直就是挥霍公款的天堂

150元的标准,晚上吃饭的标准就高到每人300元”,“鲍鱼、鱼翅、海参等常规的东西有,其他还有什么想吃的,只要提前提出来都可以安排”……试问,这像是一个食堂吗?即使加上“特殊”二字,这依然不是食堂,倒像是一个挥霍公款的天堂。

王志瑛想必也明白,只说这是食堂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其在食堂前面加了“特殊”二字,但其同时又非常刻意弱化“特殊”二

字,言下之意,招待领导就是要特殊一些,而这种特殊已经不再特殊,而是司空见惯的事。

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为了招待领导,在湿地公园内办会所是可以特殊的,会所没有办证就经营是可以特殊的,花费高是可以特殊的……甚至在面对质疑的时候,理由也是很特殊的——“只不过是一个‘特殊食堂’罢了”!

一群特殊的人,去一个特殊的地方,进行了特殊的消费,究竟

谁在进行常态化的监管?历年来,每当舆论质疑每年数千亿元的公款吃喝时,大家都把目光对准提供接待服务的一方,可是,那些去大吃大喝的人,是谁让他们吃得那么心安理得的呢?

“特殊食堂”无关“食堂”只关“特殊”,不是“食堂”特殊,而是去“食堂”的人特殊。如果每个人都在被监督的范围内,如果每项权力都受到有效制约,所有食堂自然就会不再特殊。(李辉)

第三只眼

这则报道之所以雷人,首先,无疑应该归结为王志瑛的几句实话。一句是,(官员)“以往吃饭都是到外面,费用挺高的,一年招待费用也要几百万。而且花钱多也就算了,有时候还吃得不好,让领导不满意,我们也很难堪。”另一句是,面对网民质疑,王志瑛称:这有什么好质疑的。共产党办一个酒店不就是为了招待领导时,标准高一点,接待好一点吗?

应该说,这两句话都有实话实说的意味,但反观“让领导满

“让领导满意”不止是冷血实话

意”,其释放的信号绝不止于冷血实话,还有许多让人不安的信号。

其一,官本位已经异化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与其说这个豪华会所叫特殊食堂,不如说叫特权食堂,因为一般无权之人,无缘入内享用。曾有网民前去,却被挡在门外,称会馆只对政府官员开放。难怪网友质疑:“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只接待官员及宴请他们的商人们。”“干脆写个‘只对官员开放,百姓不得入内’的招牌挂在墙上,这样我们老百姓就

自觉遵照执行了。”

其二,一个公款消费的畸态标本。报道提供了一组数据:在该豪华会所,吃饭标准不含酒水,一般是每人300元,如果想要好一点,每人500—600元。都说公款吃喝数字惊人,该会所无疑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其三,官场潜规则已经显现化。其实,无论是“让领导满意”还是“办一个酒店不就是为了招待领导时,标准高一点,接待好一点吗?”都很雷人,都是不可言明

的潜规则,是可体会而不宜外传,身为无锡市惠山开发区党政办主任,王志瑛不会不知,但他为何不惮于毫无顾忌地吐露出来?很显然的理由是,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潜规则,在他看来这是公众皆知的明规则,面对质疑,他表示很不理解,觉得没什么好质疑的。

“让领导满意”不止是冷血实话,这家用权力发酵的食堂,让我们读到诸多难解的图景,如此下去,受伤的民意该怎样修复呢?(王石川)

热点纵论

房地产不是经济支柱,是社会支柱

如果不仔细看,你很可能把姚景源当成了某个习惯于给房地产代言的地产商,就像屡屡放炮的任志强。因为他下面的这番话,口气实在是太像一个地产老板了,但姚景源真正的身份,却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1月19日的《广州日报》报道说,姚景源1月18日做客中国经济网时说:房价高涨带来了社会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但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因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可以强力拉动内需。

“房地产支柱论”一点不新鲜,很多开发商和亲开发商的专家都说过,但在中央对房价展开新一轮调控的今天,从具有官方色彩的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口中说出,就很耐人寻味了——是否告诉我们,就连一些中央的部门和官员,也不自觉地

患上了房地产依赖症?以至于一看到楼市调控效果初显,就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发言托市,意图影响调控政策走向。

毫无疑问,新一轮调控正在节骨眼上,各地高房价在“国11条”等政策下出现松动迹象,深圳商品房均价开始跌破两万,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大幅下跌,广州在“国11条”实行第一周内,楼市成交量甚至下跌了一半。这个时候,调控楼市的指导思想来不得半点摇摆,否则就会像前几次调控一下,最终沦为空洞,并让楼市陷入更疯狂的高价泥沼。现在这个时候,政府层面对房地产功能如何形成牢不可破的共识,可谓至关重要。

姚景源用来支持“房地产支柱论”的理由大家都很熟悉,无非是关联度高、拉动性强,这样的理论,其实是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房地产支柱论”成立硬

生生地扯出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是把一次性投资的房地产业当做支柱产业的,“实业立国”虽然是句老话,却含有至理——没有实业的支撑,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持续稳定发展。但在我国,“房地产支柱论”经过某些经济学家的传播之后,俨然成了颠扑不破的发展真理,好像没有了房地产,中国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倒退,这实在是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更傻更天真的,在房地产高额利润的裹挟之下,无数热钱涌入,很多搞实业的大企业也把主业换成了盖楼甚至转卖土地,这其中还包括很多寄托着国人“带领实体经济复苏”愿望的央企,被支柱的房地产,就这样疯狂夺取着实体经济的养分,有很多人将房地产最终绑架了中国经济,此言不虚。

回到核心的问题,房地产业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是社会发展的支柱,因为人人都应该享有居住的权利,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提供平价住房,也是政府该做的事。相应的,房地产政策也就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经济政策的核心。但在我们这边,房地产政策的社会功能被长期弱化甚至忽视了,反而是经济功能被拿出来大做文章,这也就是“房地产经济支柱论”产生的根源,也是保障性住房长期缺失的原因。

房地产政策如果不能彻底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变,对“房地产功能”不能形成牢不可破的共识,身为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的姚景源,用开发商的口气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模式被房地产绑架的下意识,让人生气,更让人无奈。(本报评论员 赵勇)

相关评论

作为一个依附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依附型产业,房地产怎么就成了“不可动摇”的经济支柱了呢?

众所周知,房地产业是名副其实的“纳税侏儒”,中国纳税500强排行榜中“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名字出现”,国内富豪榜却几乎就是房地产富豪榜,其中很多还“在巨富中欠税”——关于这些,强调房地产业是

“不可动摇”的另一面是“房地产诅咒”

支柱产业的经济学家,从来都是忽略不计。“关联度很高”是他们一再强调的“支柱”理由,事实上,所谓“关联度”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从毫不相干的“因为”,推导出十万八千里的“所以”,是相声段子中常见的幽默包袱,不买房子就不买电器不买窗帘的“关联度”逻辑,其真正是如此。真实的情况,是有更多的消费项目被房地产关联拉动,而是公众的消费能力被严

重透支,更多的消费需求被高企房价所严重抑制。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失衡,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增长方式的落后,与高房价有着更可信的“关联度”。

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叫“资源诅咒”,指过分依赖某种资源,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能力,以致在该资源枯竭时,使得该国家或地区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同样的道理,“房地产支柱”的硬

币反面就是“房地产诅咒”。当房地产业被官方长期树为不可动摇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支柱”与“房地产诅咒”实际只有一线之隔。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会遏制公众的消费能力,令其他产业部门难以获得发展空间;投资实业不如砸钱炒房,更会让经济结构越发畸形社会结构越发落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底线日益沉沦。(盛翔)

热点纵论

“生孩子要考试”亏这个委员想得出来

重庆市政协委员王小波提议:“在夫妻办理准生证的时候,就应该设置一个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的考核或考试,不达标就缓发准生证!”

(1月19日《华商报》)

又是一则雷人提议,不盯权力盯着公民权利的提案提议不时出台,让人哭笑不得。笔者也是一名政协委员,今年参加政协会议的提案是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构、公用设施的合法性审查、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笔者始终认为,规范权力的行使,更好地服务于权利,这才是政协民主监督的要旨所在,而总是千方百计地减损公民的权利,特别是那些自古就有的权利,这根本是履错了职。

这条提议,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法盲提议——合法生育权是宪法保障的根本权利,没有任何机构与个人有权限制,连政府也不例外。这样的提议之所以出台,其关键在于误读了政协民主监督的内涵,将权力监督误解于权利监督,从而时时以道德的高标,来测量公众的权利行使,恨不能以一部道德法典,而不是法律来对待公民权利。

政协的民主监督,首先应该监督权力的行使,从而实现公共管理上的善治,当前政府公共管理方面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要求政协委员始终将监督焦点对准权力,而不是对准“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公民权利。政协会议议题很多,无视权力行使方面的诸多不足,而想方设法地替权力着想如何超越法律的许可来管理民众,这样的履职令人寒心。

政协委员可以关注市民的素质,但这样的关注不能超越法律底线,不能以关注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知道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公权力应该予以敬畏,政协的民主监督权作为一项社会权,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应该有着起码的敬畏。

(邹云翔 作者系泰州市政协委员)

热点纵论

“博士跳楼”影射师生伦理衰落

南京理工大学博士周建伟因为导师交代的项目没有完成,被拒绝答辩,绝望之下欲选择跳楼。事后,学校承诺让周建伟在春节前毕业,而导师则表示不想谈这个事。

(1月19日《现代快报》)

一篇博士跳楼的新闻,赚足眼球,在整个新闻里面,充斥着博士“号啕大哭”和导师“滚出去”“你要死就去死吧”的呵斥,这让我们即使身为局外人,也忍不住心生唏嘘。其实,这样的境况,与“弑师案”和“杨帆门”等事件一样,都是师生伦理衰落的一个悲剧注解而已。

曾几何时,师者“传道授业”,学生也是“师训必尊”,师生之间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佳话屡见不鲜。但近年来,师生关系疏离,尊师重道观念淡薄,师生伦理衰落的现象几成常态。

回到新闻中,作为导师,不是本着真正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态度,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而是在学生表达相左的意见后,咆哮着“滚出去”“你要死就去死吧”,假如如新闻所述属真,哪里还有一丝师道尊严?同样,作为学生,不能与导师很好地沟通与协调,去争取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将自己置于一种跳楼的要挟中,这哪里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气质?

师生伦理的衰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本质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必然,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特别是在大学里,导师做老板,学生跑腿,这样的师生关系,如何能融洽?

要想改变这一困境,就必须从制度和职业道德层面给予教师和学生以必要的制度和责任约束。(邓为)